

---

# 贵州返贫风险实证研究： 基于潜在剖面模型分析

王子 陈茜<sup>1</sup>

(中共毕节市委党校, 贵州 毕节 551700)

**【摘要】:** 采用分层抽样对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城乡接合部、一般贫困村和深度贫困村的监测户进行问卷调查, 基于家庭在校学生人数、家庭规模、收入变量、支出变量 4 个维度, 通过潜在剖面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贵州在返贫风险研究中主要存在的风险有急难型返贫、政策依赖型返贫、经营风险型返贫、动态就业型返贫等。对返贫工作中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 提出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为贫困治理提供了有效启示。

**【关键词】:** 贵州 返贫风险 潜在剖面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 1 研究背景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 脱贫农村和地区成规模返贫又可能成为新的“三农”问题, 因此设立 5 年过渡期, 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近五年来, 无论是产业发展、生态建设还是大数据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 贵州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 贵州在脱贫攻坚取得斐然成绩的同时, 也意识到在部分地区脱贫成果尚不稳定, 产业基础仍然薄弱, 脱贫人口的经济收入仍不稳定。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贵州不同地域仍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返贫风险。本课题通过对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城乡接合部、一般贫困村和深度贫困村的监测户进行入户调研, 利用潜在剖面模型分析进行风险维度聚焦, 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 为贵州省返贫风险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 为更好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提供可行性研究。

## 2 研究设计

### 2.1 研究对象

通过分层抽样对贵州省监测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发放区域涉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城乡接合部、一般贫困村和深度贫困村, 问卷发放范围涉及因学致贫、因病致贫、因资金致贫、因技术致贫和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致贫各类。问卷发放一共发放问卷 150 份, 剔除项目缺失等无效问卷 26 份, 得到有效问卷 124 份。其中, 户主性别为男性的占 91.1%, 女性占 8.9%; 户主年龄在

---

<sup>1</sup>**作者简介:** 王子(1989-), 女, 贵州毕节人, 讲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心理咨询与辅导。

**基金项目:** 2021 年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发展制度保障高端智库)课题《贵州返贫风险实证研究: 风险因素、维度聚焦与路径探析》研究成果之一

30岁以下的0.8%，31~60岁的79.8%，61岁以上的19.4%；家庭最高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的25.0%，中职或初中的48.4%，高职或高中的12.9%，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3.7%；家庭最高劳动技能为无劳动力的8.1%，弱劳动力或半劳动力的4.0%，普通劳动力的87.9%；家庭基础健康状况全部健康的59.7%，有轻微病症人员的12.9%，有大病、长期慢性病人员的20.2%，有残疾人员的7.3%；居住地属性属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20.2%，城乡结合部的16.1%，一般贫困村的37.9%，深度贫困村的25.8%。

## 2.2 指标选取

### 2.2.1 人口学变量

主要涉及研究对象的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在校学生人数、家庭最高受教育水平、家庭最高劳动技能、家庭基础健康状况、居住地属性。

### 2.2.2 条件变量

贫困涉及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本等生计能力增加，以及相应资产、生产经营活动收入、经济机会的风险，谋求健康、教育、社会排斥、能力剥夺等福利风险<sup>[1]</sup>。因此，本研究的条件变量主要涵盖家庭在校学生人数、家庭规模、收入变量、支出变量4个维度。所有变量均以2020年数据为基准。①家庭在校学生人数：家庭在校就读、不能计算为劳动力的人数，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和非义务教育阶段。②家庭规模：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家庭劳动力结构。家庭人口数：家庭户口记录人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家庭内除却衰老、生病、残疾和就读等因素，能够创造家庭收入的人数。家庭劳动力结构：家庭人口数和家庭劳动力人口数的比值，比值越接近0家庭劳动力越弱，比值越接近1家庭劳动力越强。③收入变量：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人均纯收入是年收入基于家庭人口数的均值。工资性收入主要包括家庭成员按月发放工资、补发工资及奖金、津贴等，含外出务工人员寄带回的收入和从单位或雇主得到的实物及服务折价。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指家庭成员从事种植养殖得到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油料收入、经济作物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和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收入、红利收入、储蓄性保险收益、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收入和出租房屋、机械等收入。转移性收入包括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补助(包括低保、扶贫款、救灾款、救助金等)、政策性生活补贴(包括家电补贴、从政府或组织免费或低价提供的住宿(廉租房)及其他生活补贴)、报销医疗费(不包括商业保险报销的医疗费)、赡养收入和现金政策性惠农补贴(粮种补贴、粮食直补、农机具补贴)等。④支出变量：家庭刚性支出、日常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和家庭经营费用。家庭刚性支出是指除日常支出外的各种必要性支出。日常支出指家庭成员维持家庭正常生活所需的基础生活成本。教育支出主要是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免除费用以外的自费支出、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医疗支出主要是除医保报销和就医补助之外家庭成员就医的自费部分，以及就医期间产生的生活费用。家庭经营费用主要是家庭种植养殖等家庭经营的前期投入费用。

## 3 结果及分析

###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因为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校标变量之间认为的共变，容易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根据 Podsakoff 等<sup>[2]</sup>的建议进行了事后检验，采用了 Harman 单因子法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5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度24.425%。Podsakoff 等<sup>[3]</sup>认为符合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超过1个，用EFA(未旋转)得到的单一因子方差解释度不超过50%的检验标准，也低于国内一般认定单一因子方差解释度不超过40%的标准<sup>[4]</sup>。也就是说，共同方法偏差的确存在，但是在本研究中并不明显。

### 3.2 相关性检验

本研究中，家庭在校学生人数与家庭劳动力结构和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r=-0.380$ 、 $-0.260$ ,  $P<0.01$ )，与家庭刚性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0.205$ ,  $P<0.05$ )；家庭劳动力结构与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0.463$ ,  $P<0.01$ )。

### 3.3 潜在剖面分析

对本研究中收入变量和支出变量的 10 个子维度分别进行 K-means 聚类分析，聚类数均为高、中、低 3 类。聚类后 10 个子维度的  $P<0.01$ ，说明聚类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将家庭在校学生人数、家庭规模和进行 K-means 聚类分析后的收入变量、支出变量一起纳入 Mplus，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的模型拟合。逐步增加类型的数量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指数中 AIC、BIC、aBIC 的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Entropy 指数表示分类准确率，Entropy 指数越接近 1 分类准确率越高，模型 K 的 BLRT 的值达到显著性水平 ( $P<0.05$ )，表明模型 K 比模型 K-1 的方差解释率高，模型更优。表 1 呈现了 LPA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模型类别个数的增加，信息指数 AIC、BIC 和 aBIC 不断减小，表明模型拟合越来越好。Entropy 在 2 类别时就达到 1，说明 2 类别以上的分类精准度都很高；且 BLRT 在 2 类别以上都具有统计学意义。AIC 和 BIC 在 6 类别依然有显著降低，但是考虑到模型的简洁性，选择 4 类别模型为最佳模型。

如图 1 所示，根据监测户的具体特征对类别一、类别二、类别三和类别四分别命名。类别一的家庭家庭规模适中，人均收入低，刚性支出高，且主要是医疗支出。据此，将类别一的监测户命名为人均低收入、医疗高支出组，该类别的家庭占 2.4%。类别二的家庭规模适中，人均收入偏高，财产性收入高且家庭经营费用高。据此，将类别二的监测户命名为财产性高收入、家庭经营高支出组，该类别的家庭占 1.6%。类别三的家庭人口规模较小，家庭劳动力结构偏低，人均收入低，转移性收入高。据此，将类别三的监测户命名为人均低收入、转移性高收入组，该类别的家庭占 67.5%。类别四的家庭规模偏大，工资性收入高，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低。据此，将类别四的监测户命名为大型家庭规模、工资性高收入组，该类别的家庭占 28.5%。

表 1 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

| 剖面数 | AIC      | BIC      | aBIC     | Entropy | BLRT        | 类别概率                                |
|-----|----------|----------|----------|---------|-------------|-------------------------------------|
| 1   | 2924.808 | 3003.550 | 2915.016 | ---     | ---         | 1                                   |
| 2   | 2548.817 | 2669.741 | 2533.778 | 1.000   | -1434.404** | 0.976/0.024                         |
| 3   | 2209.052 | 2372.159 | 2188.767 | 1.000   | -1231.408** | 0.325/0.650/0.024                   |
| 4   | 2008.985 | 2214.274 | 1983.454 | 1.000   | -1046.526** | 0.024/0.016/0.675/0.285             |
| 5   | 1828.913 | 2076.385 | 1798.136 | 1.000   | -931.492**  | 0.016/0.675/0.285/0.016/0.008       |
| 6   | 1656.503 | 1946.158 | 1620.480 | 1.000   | -826.457**  | 0.008/0.675/0.016/0.268/0.016/0.016 |

注：N=124；“\*”表示差异显著 ( $P < 0.05$ )，“\*\*”表示差异极显著 ( $P < 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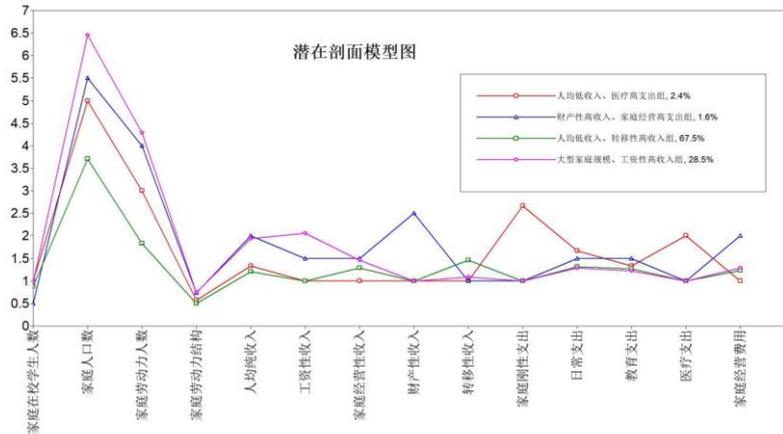


图1 潜在剖面模型

## 4 结论与讨论

### 4.1 返贫风险

根据潜在剖面分析的不同类型家庭的特质和所面临的风险，将贵州主要显著的返贫风险做如下四种分类。

#### 4.1.1 急难型返贫

急难型返贫主要是指遭遇生活重大变故或意外所导致的家庭刚性支出过大，整个家庭无法承担支出所需形成的返贫类型。在研究中显示一类型的家庭主要特征是家庭刚性支出过高，其中主要是医疗支出过高。

#### 4.1.2 经营风险型返贫

经营风险型返贫主要是指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家庭，虽然其人均纯收入指标看起来良好，但是当遭遇到自然灾害和动物传染病等不可控风险因素的时候，由于家庭经营性费用支出较高，会导致整个家庭前期投资的经营成本转变为沉没成本而产生返贫风险。

#### 4.1.3 政策依赖型返贫

政策依赖型返贫主要是指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政策社会救济和补助(包括低保、扶贫款、救灾款、救助金等)和政策性生活补贴，本身并不具有生产力，或者家庭生产力创造的财富值并不足以覆盖家庭基础生活支出所需，一旦政府政策和救助标准变化和浮动，就会第一时间受到冲击性影响的风险类型。

#### 4.1.4 动态就业型返贫

动态就业型返贫主要是指家庭收入仅依靠工资性收入的家庭，当工资性收入不稳定时所遭遇的阶段性返贫。此次研究中四类家庭就主要面临动态就业型返贫，此类风险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由于搬迁后家庭不能继续进行种植养殖，这种基础劳动性被剥夺导致家庭经营性收入完全丧失，并且日常开支急剧增加。

---

## 4.2 对策建议

针对急难型返贫，主要是突发意外伤害导致刚性支出过高的情况可以选择健康扶贫，医保部门提供医疗报销自付金额。另外，政府可为该类家庭成员提供救助式岗位，既能缓解家庭支出压力，也能方便照顾家庭成员。针对政策依赖型返贫，主要是将整户无劳动能力的家庭，纳入民政兜底保障；针对缺乏内生动力且有劳动力的家庭，改变“输血式”帮扶模式，开展政策宣传、心理疏导和感恩教育等方式，激发群众内生动力。针对经营风险型返贫，政府应加大防灾抗灾的投入力度，强化农户防灾抗灾救灾意识的培养，加强防灾抗灾救灾方面的知识学习，减小因灾害带来的损失。加强与商业保险公司的合作，开发针对返贫对象需求的保险产品，鼓励收入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边缘户购买，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针对动态就业型返贫，其对象是易地扶贫搬迁人员，政府应加大对该类家庭成员的技能培训力度，输出有一定技能的人员到发达地区务工，提高他们的个人收入从而为家庭创造更高的收入，稳步脱贫。

### 参考文献:

[1]黄承伟, 庄天惠, 陆汉文. 自然灾害应对与扶贫开发理论与实践[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2]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Y, PODSAKOFF N P.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05):879-903.

[3]PODSAKOFF P M, ORGAN D W. 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6, 12(4):69-82.

[4]汤丹丹, 温忠麟.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问题与建议[J]. 心理科学, 2020, 43(01):215-223.